

## 王 平<sup>①</sup>

我父亲叫王幼钦，兄弟四人，他排行第四；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我是老六，在我未满周岁的时候，母亲病故了，父亲就把我大姐从婆家叫回来照顾我，不满十岁的大姐就抱着我像讨饭一样，满村里转，哪家能吃到奶就到哪家去；母亲去世不久，父亲续房，继母不如生母会管家，待我也不好，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她就专门想法整我，家里的环境越来越不好，我实在不愿意呆在家里，父亲怕我离家出去，就想办法拴住我，十七岁那年，由他包办了一门亲事，我对这桩封建婚姻极为不满，总想找机会离开。

我原名王惟允，一九〇七年十月十二日（农历九月初六）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三溪口镇永福里横溪沅乡大湖地村。阳新位于鄂东南、湘鄂赣三省分界的幕阜山北麓，属低山丘陵地区。大湖地村坐落在两道岭子中间的河谷里，横溪沅由东向西从村边流过。岭上树木繁茂，河谷土地肥沃。解放以后阳新修了王英水库，大

<sup>①</sup> 王平，一九〇七年生，湖北阳新人。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本文节选自《王平回忆录》。

湖地村成了水库区，淹没在库底。

我的家庭，解放后按田亩数定为中农成份。实际上，解放前家境很贫困，常常是拆东补西，寅吃卯粮，家庭生活并够不上中农的水平。我父亲叫王幼钦，兄弟四人，三伯父早逝，父亲排行第四。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我是老六，两个哥哥早年夭折，三个姐姐都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大伯父和二伯父家的人口比我家多，我有十多个堂兄弟。祖母在世时，她单独住，有一亩养老田由我父亲照管。

在我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鲍美玉就病故了。这时父亲把我大姐从婆家叫回来照顾我，不满十岁的大姐就抱着我像讨饭一样，满村里转，哪家能吃到奶就到哪家去。后来一个本家房里的侄媳孩子死了，姐姐常常抱我到她家去吃奶，大约吃了一年后就在家吃米糊糊。就这样大姐把我带到六七岁才离开。母亲去世不久，父亲续房，继母带来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小名叫陈细崽，继母不如我母亲会管家，虽然父亲常年在田间辛勤劳动，精耕细作，但家境大不如从前了。

我五六岁就帮家里放牛，我们村附近，大部分是水田，放牛走田埂。一次我从田埂掉到水塘里，是村里人及时打救，才未被淹死。到七岁的时候，父亲考虑应该让我们读点书，识点字，免得日后被人欺负。但家境贫困，供不起我和细崽两人上学，决定让我上学。我十二岁时，继母生了个弟弟，细崽原先的族叔没有儿子，就把他接回去了。那年庄稼收成不错，家里原有三间房和一间厨房，父亲觉得不够用，决定在院子里再盖几间。盖房子需要人手，父亲让我停学，专门上山砍柴烧水，给修房的工匠们送茶送水，干些杂活。第二年，房子盖得差不多了，我又接着上学，那时的小学是半新半旧式的，基本上还是私塾的那一套，主要读四书五经，也学点国文、算术，搞点体操。

我的继母待我不好，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她就专门想法整

我。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用小板凳打破了她的头，然后逃到外地躲藏起来。娘舅来找我算账，没有找到。

父亲有个好朋友叫王巍之，在村里开个小药铺，父亲和他商量让我给他看铺面，请他教我学中医。我再次停学到药铺去当学徒，谁知王巍之只让我帮他抓药，根本不教我中医知识。我干了一年多，他让人传话，他没有儿子，想让我做他的儿子，如果我答应了才教我看病。我听说以后很生气，坚决不在他那里干了。不过在药铺里有许多空闲时间，虽然没能学成中医，却抽空看了不少书，除了中药书以外，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都是那时候看的，也算没有白过。

离开药铺以后，我去县城考上了高等小学，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未能去成。我大伯父是开经馆（私塾）的教书人，他让我到他的经馆读书，经馆地点不是固定的，读的全是古书，我对他的经馆不太满意，读了一段时间，就转到前清秀才尹韬修开的经馆去。尹老师的经馆设在离我家十里地的四团寺里，他为人开明，不要报酬，给学生讲文学，教怎样写好文章，我跟他学习得益不浅。尹老师还订了上海《大公报》等一些报刊，学生们可以随便看，这时我才知道世界上有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等时事，对不明白的问题，学生们自由议论，尹老师从不干预。

父亲总是怕我离家出走，就想办法拴住我。十七岁那年，由他包办了一门亲事，结婚后分给我五亩田，让我们分开过。我对这桩封建婚姻极为不满。

我十八岁时祖母去世，继母也在同一天病故。继母的丧事比较简单，买口棺材一葬了事。祖母就不同了，她活了八十九岁，按老百姓习惯是九十虚岁，丧事要办得隆重些。二伯父主张给祖母做寿，做道场，大伯父和我父亲也同意。我们家房份大人口多，亲戚多，大伯父开经馆，亲朋好友也多，来祭奠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几天之内吃喝招待，花费不少钱，欠债很多。本来就拮据的日子，

这一来就更困难了。

过不久，父亲第二次续房，第二个继母也带来一个儿子，名叫骆明发。家里的环境越来越不好，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呆在家里，总想找机会离开。

阳新县是个大县，有十个镇，四十个里，每里五个乡。县境地势险要复杂，便于开展群众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党组织就开始在这一带活动，鄂东南地区的大冶、阳新、通山、崇阳、通城等县，都先后建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

一九二六年冬，阳新县大畈镇的陈桂芳召开会议，动员组织农民协会。横溪沅乡去了几十个人，大湖地村也去了几个，我这个人喜欢活动，也跟着他们去了。陈桂芳是国民党左派，思想较进步，他在会上讲了许多问题，有些我听不大懂，只记得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抵制日货、破除迷信、打倒土豪劣绅等等。参加会的也以青年学生居多。我是第一次参加集会，也算开了眼界。我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听了他们这些话，很感兴趣，于是积极参加了活动。

会后，横溪沅乡也成立了农民协会，成员多是小知识分子，农民王兴香被推选为农协主席。我是乡农协委员，也是大湖地村农协的负责人。农民协会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封建，破除迷信等等。农民协会主要是搞宣传活动，也做了一些打土豪劣绅，戴高帽游街，砸庙倒菩萨等事情。当时听到谁家做道场，就组织人去冲；到处宣传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剪发、放脚。这些都是农民协会成立初期自发的活动，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农民运动还没有走上真正的革命轨道。

一九二七年二月，阳新各地的地主土豪大都跑到县城，他们和反动县长一起策划杀害了省农民协会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位同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二七”惨案，农民运动因而受到了

影响，地主势力大的村子农民运动更搞不起来了。后来，武汉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派军队来镇压了阳新的反动势力，土豪劣绅们不少逃往大冶县，阳新的农民运动才又蓬勃发展起来。大冶县的农民运动比阳新落后一步，我们曾组织人去大冶县的刘仁八搞宣传，推动那里的农民运动。我们在那里围攻了一家有机愤的恶霸地主，放火烧了他的房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的气氛也波及到鄂东南，有些农民协会不敢开会活动了，有些头面人物开始打退堂鼓。我们就到处做工作，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鼓动大家继续参加斗争。

五月，驻扎在武昌的夏斗寅师，受蒋介石策动叛变革命，被叶挺率领的革命军击败。夏斗寅残部从武昌溃退到咸宁，分路逃向鄂东南各县，然后经金牛到大冶、黄石港过江。夏斗寅残部沿途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捣毁各级党群组织，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夏部一个团从距我村五里地的大坪塘经过，当时农民协会还弄不清他们是叛军还是武汉的国民革命军，仍然热情欢迎招待。他们的先头部队也喊口号支持农民协会，可后续部队一到就动手抓人了，砸了大坪塘的农民协会，把关押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都放了。我在村里听说来了国民革命军，也兴冲冲地赶往大坪塘，走出三里地就遇着逃出来的人，说那里在抓人，我就转身返回大湖地村。

不料，大约一个连的夏部士兵紧跟着来到我们村，村里有所准备，但我没来得及逃脱，一小队士兵把我叫住，指名让我带他们到王惟允家，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却不认得我。我就带他们绕来绕去走到后山一所没有什么人住的院子，指给他们这就是王惟允家，他们当真去敲门，我趁他们不注意时就跑脱了，他们是根据土豪劣绅提供的情况来抓我的。

夏斗寅的残部只是路过，没有驻扎。他们过去以后，农民协会的活动又恢复了。这时人们对反动派的罪行感到气愤，真的起来造反了。群众起来以后，那些土豪劣绅和为非作歹的流氓地痞就老实了，纷纷向农会低头认罪，表示改恶从善。那时农民协会对坏人只批斗、不杀人。

三溪口是阳新的一个大镇，那里的群众组织里有共产党人，店员工会主席鲍顺成就是共产党员，他和我生母是同姓，有点远亲关系。认识他以后，他说要介绍我们村五个人入党，并确定七月的一天在三溪口开会宣誓。那天，我们五个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往三溪口，走到离镇子还有几里地，准备过河的时候，遇到从三溪口跑出来的一些人，据他们讲，大冶县过来一部国民党反动军队，还跟着什么“清乡会”、“民团”等等，把三溪口的工会、农会都砸了，捉了一些人。

原来，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在七月十五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其残暴程度不亚于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他们到处封闭工会、农会，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阳新一些跑到外地的土豪劣绅也纷纷回来，进行“清乡”，反攻倒算。我们五个人没到三溪口就折返回来，和鲍顺成也失去了联系。

我们村的大恶霸王恒宇，平时欺压群众，作恶多端，群众运动起来后，曾批斗过他，这时他组织“清乡队”，在村里抓人。不过，他只抓那些小姓的，抓起来就罚款，不出钱就不放人，并扬言有共产党嫌疑的往县里押送。他不敢抓我们家的人，因为我们同是大姓，而且我家是上屋，房份大，兄弟多；他是下屋，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我们放出风去，王恒宇胆敢抓我家的人，我们就与他一个顶一个。所以他不敢惹我们。村里还有个大地主叫王惺春，这个人比较开明，他舅舅是清末的举人，新县长上任都得先拜访他家，他在县里后台比较硬，他同王恒宇有矛盾，同情农会，经常住在城里。这时王恒宇把姓黄的人，抓了几个，送到

县城关起来，我们就到县城去保释，经王惺春调停，罚了点款就把人领回来了。

我在村里虽然一时没有什么危险，但国民党兵随时都会下来清乡，心里总是不踏实，晚上也不敢在家里过夜，躲到山上，这里住一夜，那里住一晚，游来荡去，又不敢离开本地。这种情况一直拖到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县里让王惺春回乡负责“清乡”，他宣布一律既往不咎，一个人也不抓，这一来才太平了。情况稳定了些，我们又开始活动，虽然不能公开组织农会，就秘密搞“同学会”“同年会”经常聚会私下议论问题和形势。

一九二九年初，阳新的共产党组织和三溪口的群众组织失去联系，这时从通山县过来的共产党组织在黄沙镇一带又进行秘密活动，他们执行盲动主义，往往在夜间组织人杀土豪劣绅。他们逐渐把活动范围扩大到三溪口一带，一天夜里他们又杀了王恒宇的儿子王达方，还杀了王恒宇那一房好几个人，王恒宇逃到阳新县城。后来他们找到我们这些当地的活动积极分子，提出要组织秘密农委会。据他们说，这是党的外围组织，和原来的农民协会性质不一样。他们还宣布：凡是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如果现在不来参加，就一律当成国民党反动派来对待。我的很多同学是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过活动的，他们都跑到城里去了，农委会要我到县城动员他们回来。因为我有一个舅舅，就是第二个继母的叔伯兄弟，在阳新县城里一家商店做管事，我可以利用这个亲戚关系进城活动。

我装着做买卖的样子去县城，还顺便沿路贴一些传单。我提了一个篮子，把浆糊和传单放在里边，上面盖了一摞商店的商标广告做掩护。我走到离村子十几里的地方过“莫忙”凉亭，这个亭子像个门楼，大路从中间穿过，一边的门楣上刻着“莫忙”，一边刻着“到了”，意思是告诉你要去的地方快到了，不要着忙，在这里歇一歇乘乘凉再走。到这里我刷好浆糊，正要贴标语，蓦然

看见一连士兵向凉亭走来，我赶忙换贴广告。两个打前站的走到我跟前：“你在干什么？”

“糊广告。”

“广告下边是什么东西？”

“全是广告。”

“你撒谎！”

“不信你们自己看！”

他们没有翻就让我走了，过后真出了一身冷汗。到了县城以后，听说这支队伍在大坪塘停了一下，就向咸宁方向走了。对这支队伍的情况说法不一，有的猜测里边有共产党。

我到县城，在一间熟悉的饭铺住下，把住铺日期登记到王达方被杀之前，免得遇到王恒宇说不清楚找麻烦。我先去看王惺春，他说：“你怎么这个时候到城里来，王恒宇就住在王氏公所里，你不能在这里住久了。”从王惺春处出来，我就去找同学串连。真是冤家路窄，一天我在大街上正好和王恒宇碰了个对面，他垂头丧气的，问我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就告诉他在饭铺登记的日期，他叹了口气，没有和我纠缠什么就走开了。以后有人给我通气说：“你不能在县城继续呆下去了，王恒宇的亲戚说你参与杀王达方，主张让王恒宇抓你报仇。”我听他们诬赖好人，一下子火冒三丈，非要找他们说理算账不可。别人劝我还是冷静些，王恒宇有钱有势，你单枪匹马与他斗是要吃亏的。水清自见底，他的儿子被谁杀的，将来总会搞清楚，还是暂时不与他争辩好。是走还是不走，当时我也拿不定主意。我想这时候走，不就真是做贼心虚了吗？我又去找王惺春，他说：“你还是走好，这样会更安全些，不过不走也没有什么麻烦 我还可以保护你。”我说：“还是走吧。”于是他给了我三块现洋作路费，让我离开县城。

我和一个同学相伴，在一天夜晚，出县城南门，到富水河边。这时县里正抓丁修城墙，把船都封锁了，我们到一个船家，请

他趁夜把我们送走。当时按公价搭一个人是五百钱，我们两个人答应给他两块现洋，他终于动了心，同意开船。天亮时分，王恒宇知道我离开了，就派船追。我们走南路，坐船走了二十里，到广口乡就上岸改走旱路，王恒宇的人没追着我。

我们走了一天，路过我第一个继母的儿子陈细崽住的村子，这是个大村，平时都戒严，我以亲戚关系进村住了一宿。回到乡里后不久，城里那些同学就陆续回来参加活动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三溪口镇的樊镇玉、尹善卿两人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安排我到山上去教书，实际上以学校为掩护，接待过往人员。后来我发觉情况有点不对头，参加农委会的大多数是些上层人物，不少是哥老会、洪门会的头面人物，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王茂林就是哥老会的头子，他们搞所谓“洪共合作”。那时我对党的知识知道得还不多，但总感到他们这种做法不对头。

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起，红五军转战到湘鄂赣。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五军第五纵队和大冶中心县委在鄂东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消灭反革命武装，开辟和建立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十月，红五军第五纵队在阳新赤卫队三千余人配合下，攻克阳新城，全歼范石生两个营。十二月十四日，由何长工领导的第五纵队，配合在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中的共产党组织，在程子华等人的组织带领下，发动了大冶兵暴和阳新起义。一九三〇年一月中旬，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次攻占阳新县城。

红军的到来，大大促进了阳新的群众运动，并逐步纳入革命的轨道。我记得红五军第五纵队路过大坪塘的时候，曾召开一个群众大会，第五纵队党代表何长工和纵队司令李灿在会上都讲了话，公开宣布他们是江西过来的红军，到阳新来消灭民团，开展武装斗争，还讲了党的宗旨和政策。群众听了都异常高兴，一些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我在会场上遇见了鲍

顺成，他已经参加红军，是红八军（红五军第五纵队改编）第二纵队的副官，我告诉他我入党的经过和工作情况，以及想参加红军的愿望，他让我多和他联系。

红八军来了以后，农委会就公开活动了，成立乡、区苏维埃政府，开展抗捐、抗租、抗债斗争。我积极参加组织宣传队，动员群众支援红军、支持苏维埃、参加革命斗争。

我父亲对我参加农民协会的活动是积极支持的。那时到我家的来往人员不少，有时开会就在我家吃饭，我父亲曾开玩笑地说：“你们革命，我赔了不少谷和酒。这些我都心甘情愿。只是担心你们能不能成功，过去（指一九二七年前）上边来人都没有搞成功，现在你们自己组织能行吗？”在斗争过程中，我家抗了几百元的借债，我父亲又高兴了，他讲：“只要你们革命能长久，能成功，我当然赞成、支持。”

一九三〇年初，乡、区又成立了共青团组织，其成员大都是青年学生，地富子弟居多。他们和年岁较大的、以农民为主的党组织往往意见不一致，处处闹独立，两者矛盾很大。我觉得乡里斗争情况复杂，环境不好，决心参加红军。我曾听鲍顺成说过，五月份红八军要从三溪口过，就找区苏维埃政府请求参军，他们给我开了参军介绍信，有四个下屋的叔伯兄弟听说我要参加红军，也要和我一道去。一天，红八军到了大坪塘，歇一宿就开往通山。我打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到下屋去找那四个兄弟，打算约好第二天清早一起去赶红军，谁知他们都动摇了，他们家里的人都推说不在家，也就只好算了。我家里都赞成我参军，晚上专门为我饯行。第二天清早，一个堂哥把我送到大坪塘前边的吴家凉亭，红军的队伍已经过来了，我在队伍里找到鲍顺成，连忙把介绍信递给他，他说：“好吧，一道走。”就这样我离开家乡，参加了红军。

## 王宗槐

我家祖籍在福建，算到我这一辈，祖上迁到江西已经是第十九代了，我们家是几代贫农，主要靠种田兼织夏布维持生活；我原名叫王永开，小名二伢子，刚一岁母亲就染病身亡，八岁那年父亲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从此我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孤伢子，好心的小姑姑见我生活实在太困难，含着眼泪，背起我的铺盖卷，对我说：“跟我走吧，苦伢子！”十一岁开始，我跟着四叔学习织夏布，叔侄关系也随之变成了师徒关系，除了学技，四叔家的家务活几乎全部由我承担；我艰难地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之后，我的三叔公使我凄凉的心里得到温暖，他是我的启蒙教师和革命引路人。

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民国四年农历七月初四，我出生在江西省万载县柏树街白茅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

白茅冲，离万载县城四十几里地，是个穷困的山沟沟。这里

王宗槐，一九一五年生，江西万载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本文节选自《王宗槐回忆录》。

所住的二十来户人家，都是客籍。当时，本籍人大多住平坝，客籍人只能居住山沟边坎地带。当地的本籍人大都姓刘，大多势大，所以流传着“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刘不成村”的民谚。我家祖籍在福建省武平县桑子坑。算到我这一辈，祖上迁到江西已经是第十九代了，我们王家祖祖辈辈已在白茅冲住了几百年。

我的祖父叫王洪启，祖母的姓氏记不清楚，她一世生了八男五女，其中五个早年夭亡。到我记事时，只有我父亲、四位叔叔及三位姑姑。我们家是几代贫农，主要靠种地兼织夏布维持生活。我的几位叔叔以织夏布为主兼种田，而我父亲则专干农活，除种自家的几亩地外，还到几里路外的龙田村租种富人家的田地。

父亲王科发，母亲孙氏，生下我们兄弟两人。兄长叫王永初，比我年长三岁。我来到这人世间刚刚一年，母亲孙氏就染病身亡。母亲的遗体安放在门板上，我还以为是睡着了，拉着她的手，吵着要吃奶。姑姑见到这种令人心酸的情景，硬是把我抱开了。从七岁开始，我就跟着父辈们下地干些拔草、捉虫、摘豆、放牛等比较轻些的农活。

八岁那年，白茅冲的几户人家联合起来，在一个小厅子里办起了私塾。每家出资几块光洋（银元），请了一位教书先生，教几个小孩子念书。我也进了这所私塾。教书先生名叫汪先通，年约四十多岁，是我小姑姑的公公。他为人厚道，教书既严格又耐心。我们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幼学寻源》等蒙童课本。那时读书，主要是跟着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念“人之初，性本善”、“之乎者也”等，一味背诵，并不解其意。好在年幼记性强，有的文章，只要念上一个多时辰，就能够一口气背诵下来。这使汪先生很高兴。汪先生教书规矩严格，稍有违反，就要挨打板子。我就曾被打过两回板子。头一回，是描大字时，不知不觉中脑袋歪了，后脖子根挨了一板子。另一回，是中午放学回家时，到水坑扎猛子（潜水），把先生写在手背上的红字洗掉了。下午上学

先生一查问，只得招认是玩水儿去了。先生就让我伸出手来，在手掌上打了十几板子。打学生我不赞成，但老师严格要求是对的，否则，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

八岁那年，年仅四十岁的父亲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从此，我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孤伢子，私塾也上不成了，总共念了八个月书。

父亲一死，五个叔叔就分了家。分家时，把全部家产（十间土坯房、七担谷子田及几架织布机）分成六份，抓阄。我和我哥算一份，我们兄弟俩分到的财产是一间土坯房、二担谷子田、一小块山地和一些破旧的盆盆罐罐，还有一卷不知打了多少补钉的铺盖、衣服。同时也摊到了哥哥娶嫂子时欠下的三十块钱债款。后来把山上的松树砍下卖了，才还清了这笔债。分家后不久，好心的小姑姑见我同哥哥嫂子一起生活实在太困难，含着眼泪，背起我的铺盖卷，对我说：“跟我走吧，苦伢子！”

小姑家住在离白茅冲四里路的一个小山村里，总共只有两户人家，是个穷乡僻壤。小姑的家境也很穷。我就帮着砍柴、照看姑姑的小女儿，干些力所能及的杂活。添了我这张嘴，小姑家的日子更难熬了。十一岁那年，我又回到了白茅冲，跟着我四叔学习织夏布；叔侄关系也随之变成了师徒关系。

和当时普天下的学徒工一样，我也要先尽徒弟的义务，才有学技的权利。婶婶生了一个小女孩，主要管孩子。做饭、打柴、割猪草等家务活，几乎全部由我承担。这样忙乎了一年，四叔才让我练习蹬机、推挡、抛接梭……

我个子小，腿短，踩不到踏脚板，只好在机座前边，架上一块横木板，坐在这块木板上操作。每蹬一下，屁股就在木板上蹭一次。前蹭后磨，不到一天的功夫，屁股就磨破了，痛得吃饭都不愿坐凳子。更难受的是两条臂膀，由于胳膊短，操作时两臂几乎一字形地伸展着，干不了多久，就很疲劳，一天下来，又肿又胀又酸痛。

叔叔家的织布机安在地坑的壁洞里，阳光射不进，风儿吹不进，光线暗淡，空气湿闷。为了保持干净，我每天黎明即起，进行清扫。唯一公正的是大地，她给我以“母爱”；地坑壁洞给我提供了冬暖夏凉的生活环境。

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听到的只是机杼声和婶子对洞里的吆喝声：“二伢子，水缸干啦，快上来挑水呀！”二伢子，上来劈柴呀，灶门空啦！”每当听到这种声音，我就赶快放下织布机，跳上地坑去干活，干完杂活又马上操弄织布机，不敢稍有懈怠。夏布以扣门多少论粗细，扣门少，布粗；扣门多，布细。织夏布从 600 扣门开始学，经过近一年的学艺，我已能织 1000 扣门的布了，这种布可用于制做衣服、蚊帐。在这低人一层的世界里，我艰难地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

一九二九年冬天，一向沉寂的山庄似乎不那么平静了。大人们经常交头接耳地说悄悄话。连我终日生活的昏暗的织布机房也仿佛有了异样的信息，我感到我的三叔公对我更关心了，这使我凄凉的心里得到温暖。

三叔公名叫王洪夏，是我祖父的堂弟弟，也就是我的堂爷爷，比我大三十多岁。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在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白茅冲却有秀才之称。谁人看家书、写地契、解纠纷等，都乐意去求他。他以宽厚、平等待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在我印象里，他对村上的孩子都挺和蔼，从未瞪过眼或勒过嗓子。

三叔公家和我四叔家隔沟而住，直线距离不过五十来米，谁家大声说话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但走起来却不那么便当。隆冬的一天，三叔公叫我得空去他那儿一下。我心里很高兴，盼望太阳快点落山，好趁夜晚空闲去见三叔公。这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多黑的夜也没把我挡住。出了屋，我就朝西走去。摸到了毛竹桥上。桥下是一条山水冲刷成的大沟。这条大沟把白茅冲分成东西两村，这座竹桥跨沟而立，是连结东西村的纽带。我

小心翼翼地摸过竹桥，向西走，拐到了三叔公的家。

三叔公的儿子、我的堂叔在门外站着，见我去了赶忙小声地把我让进屋里，而他仍站在门口，这情景真让人感到有点儿神秘感。屋里只有三叔公一人，端端正正地坐在灶台边。灶头上，一盏豆油灯，几根灯芯草，烧得哧哧地响。尽管火光很微弱，但因我从暗处来，所以觉得很亮堂，一眼就望见了小香炉里刚刚点燃的三支红香。不用问，他在祝愿“大吉大利”。使我不解的是：灶王爷旁边为什么贴了颗巴掌大的红五星？

三叔公见我来了，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找你来，是要介绍你加入赤色工会，你是否同意？赤色就是红色，就是这五星的颜色。”接着他把工会的性质、任务，按照他的理解向我宣传了一阵子。然后，他把话题转到灶王爷旁边的那颗红五星上，说：“这五星，比灶王爷的神灵还要大，它管五大洲呢，亚细亚洲、欧罗巴洲、澳大利亚洲……全世界的人将来都要有工做，有饭吃，不挨打，师傅也不准打徒弟……”听了他这几句话，我的心一阵激动。在我表示愿意加入工会后，他领着我在五星下宣了誓。誓词有好几句，有的忘了，但至今仍记得这么几句：自愿加入工会，遵守本会纪律，严守一切秘密，实现共产社会。末尾是：“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夺。宣誓人——王怀。”

我原名叫王永开，又叫二伢子，都是小名。王怀这个大名，是三叔公这天晚上介绍我加入工会时新取的。

打从加入赤色工会、见到了红五星之后，我的思想活跃起来了，眼界开阔多了。不久，离白茅冲二里地的仙公庙门前，开了一个大会，我赶去看热闹。会上，一个称谓丁先生的人讲话，宣布一个叫吴秋生的人的罪行，揭露他是流氓恶霸，尽干坏事，暴露秘密等。接着，就有几个人把吴秋生拉到半里路外的也沟里，用关公刀砍下了他的脑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砍头，当时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相信是穷人起来整坏蛋。一九二九年冬至一九三〇年一二月份，

三叔公他们又拉起了“工农暴动队”，我也参加了“赤色少年先锋队”。发给我一把梭标，我把它磨得锃亮。一天晌午，三叔公他们带着白茅冲的百十号男女老少，拿着鸟铳、梭标，扛着土炮，参加几支暴动队统一组织的攻打大桥镇上民团的行动。我们赶到大桥镇外的山上吆喝，放鸟铳，为攻打镇子的工农暴动队助威。过了几天，暴动队和赤少队又在晚上集合起来，赶去参加攻打潭埠镇上的民团。在田间小路上转了几个小时，才到潭埠附近。还未响枪声，就传来消息说潭埠不打了，撤回。

参加这些行动，使我这个孤伢子开始看到民众的力量，从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感到不平的世道要变了。但在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连串的新鲜事。直到后来，我才逐渐懂得，乡村的这些变故，都是共产党和红军发动的，是民众起来闹革命。

原来，万载有着悠久的历史、光荣的斗争历史。它地处湘鄂赣之要冲，是军事割据的战略要地。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万载县有不少青少年冲破封建军阀的禁锢，追求进步，寻觅真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万载就开始有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特别是一九二七年冬，湘鄂赣边区党的组织，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有利时机，在红军的配合下，发动并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开展了一个以“要吃饭、要土地、要自由，抗租、抗捐、抗税”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在“年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一九三〇年二月中旬，湘鄂赣边区特委作出“关于今年‘三·一八’总示威的决定”，纪念巴黎公社诞生五十九周年，举行武装示威和武装暴动。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组织之后，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在浏阳、平江、修水、铜鼓、宜春、万载等县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打击了反动势力，鼓舞了群众斗志。

当我知道了这些后，我才明白我所经历的攻打大桥、潭埠民团等行动，是边区党组织发动的“年关斗争”和“三·一八”武装总示

威”的革命大潮中的一个浪花；才认识到三叔公王洪夏介绍我加入工会、组织我们参加暴动，是在引导我这个不懂事的穷孩子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和革命引路人。

山上的映山红开了 布谷鸟发出了啼鸣 转眼到了一九三〇年春。

一天，山村中又响起了剃头匠手中钢夹晃子发出的阵阵颤音，像沙哑的噪子在吼叫：“剃头呀 剃头呀！”听到这声音 孩子们像受惊的野兔 撒腿就跑 纷纷钻进房前屋后的竹林里。大人不去搜 他们是不会主动露头的。剃头师傅叫余观幼，是邻近村人。他待人和气 但他的理发工具太简陋 没有推子 没有剪子 只有一把又大又钝的剃头刀 剃一式的和尚头。刀不快 手脚又重 剃起头来使人痛得咬牙闭眼缩脖子，有时还给刮出一道道血口。可他是附近山村唯一的剃头匠。离了他 白茅冲也许早就变成“长毛冲”了。因此 人们并不计较他的手艺高低 反倒常常互相安慰：“剃头嘛 哪能不流点儿血！”而小孩怕痛，一听要剃头 就赶紧躲起来。

我因为没钱 也就不必像其他孩子那样去钻竹林子。一年只剃一次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他这次进村，任他把晃子刮得震天响，我照旧在织布机房内埋头抛梭。

过了一会儿 三叔公把我找去了。他向我公布了一项秘密 说：“人不可貌相啊 这剃头匠是我们的工会主席 他跟红军有联系。”

我听了后又惊又喜 真没想到 他这钢夹晃子的颤音里还有这样的佳音：几个月来梦寐以求当红军去的愿望，竟在这一袋烟的工夫内有了实现的希望。三叔公把我带去见余师傅。

余师傅说 红军已经到了小源（现称仙源）了 你想参加红军可以介绍你去。

我满口答应。

他说 那你等讯吧。

过了些日子 三叔公告诉我 红军到糟头了 你明天去余师傅